

教师必读文库
《中国教育名家名作精读丛书》
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 编 选
总主编 冯克诚



(第四辑·第十一卷)

[清] 严 复(1854年~1921年)

[清] 王国维(1877年~1927年)

救亡教育思想与教育论著选读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出
学苑音像出版社 版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教育名家名作精读丛书·第四辑/北京师联教育科学
研究所主编. —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2006. 5

ISBN 7 - 80135 - 740 - X

. 中... . 北... . 教育名著 - 作品综合集 - 中
国文学 . 2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31429 号

中国教育名家名作精读丛书·第四辑
[清]严复、王国维救亡教育思想与教育论著选读
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 编 选
总主编 冯克诚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出版发行
学苑音像出版社

北京密云红光印刷厂印刷
2006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 1/32 印张: 195 字数: 5066千字

ISBN 7 - 80135 - 740 - X

全二十册定价: 526.00 元(册均26.30元)

(ADD: 北京市朝阳区三间房邮局 10 号信箱)
P. C. : 100024 Tel: 010 - 65477339 010 - 65740218(带 Fax)
E - mail: webmaster@BTE - book. com Http: //www. BTE - book. com

教师必读文库
中外教育名家名作精读丛书
出版说明

教师职业化、专业化是当今世界教育改革共同关注的热点和焦点问题之一。教师职业素质素养达到基本要求和提高,是当前教育改革和课程改革的急迫要求。为此,我们组织相关专家重新系统地、较完整地遍选、编译、评注了这套适合中小学教师职业阅读的《中外教育名家名作精读丛书》。其编选原则和方针是:

1. 从古至今,各时代、各地区和国家有代表性,和对当代及后世教育发生直接影响的教育家及其教育思想的代表作品、经典论述。教育家的教育实践风范和教育思想对当代和后世的影响远大于制度影响,同时,对现实教师的成长也有借鉴和参考作用。作为职业教师,总听说、总涉及但在学校图书馆里总缺乏的那些著作是我们这次系统编选的重点。

2. 全套分中国卷 100 种、外国卷 100 种,每二十种为一辑,共十辑,约 200 种,同时出齐。每种含教育家的生平、教育事迹、教育成就、教育思想评析和经典教育论著选读及注解解读导读两部分。这对于全面深刻和原原本本地了解学习、运用教育家的思想和著作是十分有益的。

编者

2006 年 4 月

目
录



中国教育名家名作精读丛书 第四辑·第十一卷

[清] 严复、王国维救亡教育思想与教育论著选读

上 篇

严复的教育思想和教育论著选读

早期求学和教育活动和教育思想	(2)
(一) 早期求学和教育活动	(2)
(二) 批判“中学”, 提倡“西学”图强论	(6)
(三) “自由为体, 民主为用”的教育救国论	(8)
(四) “自强之本”的人才教育论	(11)
(五) 《救亡决论》的教育救亡思想	(17)
严复教育文论选读	(23)
论教育与国家之关系 (在环球中国学生会演说)	(23)
严复: 与《外交报》主人论教育书(节录) 光绪二十八年(1902)	(28)
严复: 救亡决论 光绪二十九年(1903)	(34)
严复: 西学通门径功用说	(46)
《天演论》选读论十一 学派	(50)
论十三 论性	(55)
论十四 矫性	(57)
论十五 演恶	(59)
论十六 群治	(62)

论十七 进化	(62)
《群学疑言》选读	(63)
订正《群学疑言》序	(63)
译《群学疑言》序	(64)
译余赘语	(67)
砭愚第一	(69)
倡学第二	(86)
知难第四	(108)
物蔽第五	(111)
智核第六	(139)
学冀第八	(164)
《治学杂论》	(188)
西学门径功用	(193)
论今日教育应以物理科学为当务之急	(196)
思古谈	(206)
读经当积极提倡	(209)

下 篇

王国维的教育思想和教育论著选读

王国维的教育思想	(217)
(一) 生平和学术教育活动	(217)
(二) 培养“完全之人物”的教育宗旨	(220)
(三) 论知识与知识教育	(223)
(四) 发展高等教育, 培养“经国扶危”人才	(227)
(五) 论学校管理	(232)

王国维教育文论选读	(235)
论教育之宗旨 光绪三十二年(1906)	(235)
王国维:教育小言十二则 光绪三十二年(1906)	(237)

上 篇

严复的教育思想与教育论著选读



严复是“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的重要代表之一。是中国资产阶级出色的启蒙思想家,他带给中国人民一种新的资产阶级世界观,使人们开始用一种新的标准,新的价值观去观察、分析问题。从而打开了人们的思想,开拓了眼界,从思想上突破了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影响深远,这是他的重大历史功绩。

严复(1854—1921),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思想家和翻译家。初名传初,字又陵,改名体乾,又改名宗光,再改名复,字几道,别号天演哲学家、观我生室主人等。1854年1月出生于福建侯官县(今闽侯县)阳岐乡。

幼受私塾教育,学习中国古代文史。1866年父死,家贫,无力参与科举考试,考入公费的福建省福州马尾船政学堂,学习英语、理化及航海术等新学知识。毕业后,在军舰实习,巡视于新加坡、槟榔屿、长崎、横滨等地,又奉命到台湾测量海口,筹设海防,抵御日、美侵略。1877年被选派赴英留学,入抱士穆德大学、格林尼次海军大学,继续深造海军战术,并于课余读英、法等国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达尔文、赫胥黎、孟德斯鸠诸人的著作。留学归国,任福州马尾船政学堂教习(教员)、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教务长)、会办(副校长)、总办(校长),培训海军人才。因受李鸿章掣肘,无法施展才能。

甲午之战,中国大败,使他深受刺激,决心投身思想启蒙,唤起民族的觉醒,挽救危亡。他在《直报》发表《论世变之亟》、《原强》等文,批判封建专制,提倡科学和民主。又和王修植、夏曾佑共创《国闻报》,宣传变法维新,同时译述赫胥黎《天演论》,并加“按语”,用进化论观点号召国人奋发图强。戊戌变法后,译《原富》、《法意》、《名学浅说》等书,把西方政治、经济等学术著作介绍到中国。在翻译实践中,首次提出“信、达、雅”翻译原则,建立起翻译理论体系。1900

年,在上海参加唐才常组建的中国国会,任副会长,并开名学会讲名学(逻辑)。后再次赴英,在伦敦会见孙中山,讨论改良与革命问题。归来后,相继任复旦公学(复旦大学前身)、安庆高等师范学堂监督(校长)。

辛亥革命后,发起孔教会,列名筹安会,主张复辟帝制,倡导尊孔读经。晚年,诋毁“五四”新文化,变成保守倒退的老人。1921年因肺疾加剧,病卒于故里。

严复的求学和教育活动教育思想

(一) 早期求学和教育活动

严复是清末海外第一批留学生,少年时即开始“治经”,学习汉学、宋学。他富于探索精神,为其“旧学”打下深厚基础。同治五年(1866年)投考福州船政学堂,因作《大孝终身慕父母论》博得沈葆楨赞许,第二年入学。在船政学堂他学习了英文、算术、几何、代数、平弧三角、热学、化学、天文学、航海术等自然学科和工程技术,以优异成绩于同治十年(1871年)毕业。新教育使他萌发了新思想。

船政学堂毕业后,严复参加航海实习,曾航行于新加坡、槟榔屿和日本的横滨、长崎各地,开始在海军服务。远航亚洲各地,使他开阔了眼界。光绪二年(1875年)严复被清政府派往英国学习驾驶,先入包士穆德,后入格林尼次海军专门学校学习。在英国学习时,他除学习海军知识以外,注意研究英国的社会政治。他从中西比较上考察中国贫穷落后的原因,寻求中国富强的道路。光绪五年(1879年)严复学成回国,任船政学堂教习,年仅二十七岁。1886年被任命为

天津水师学堂总教习,主持学堂工作。严复曾希图借助洋务派的力量来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但在出身重于一切的封建时代,“出身不由科第,所言多不见重”。所以,他的政治主张不能实现。

1896年,严复协助张元济在北京创办通艺学堂。通艺学堂是在“中外交涉事宜,条目日繁,需才益亟”的情况下建立的,目的是“造就人才,留心时务”。学习内容,除“中学”外,“专讲泰西诸种实学。”严复在通艺学堂宣讲《西学源流旨趣》,培养维新人才。1897年与王修植、夏曾佑在天津创办《国闻报》,目的是“通上下之情”,“通中外之故”。以启迪民智,唤起国人变法维新。《国闻报》与梁启超等人的《时务报》南北呼应,成为宣传维新变法的两大阵地。1902年任编译局总办。1905年协助马相伯创办复旦公学。第二年曾任该校校长数月,1906年任安徽安庆高等学堂监督。这一时期他致力翻译和著述。

1894年中日战争,中国失败,社会危机日益加深,大大激发了他的爱国精神。他进一步探寻救国真理,启发国人发奋图强,改变祖国贫穷落后面貌。这时,他连续发表了《论世变之亟》、《原强》、《原强续篇》、《辟韩》和《救亡决论》等论文,阐明变法维新的政治观点。经过中英、中法、中日战争惨痛教训,中国人民迫切需要了解世界,需要一种新的理论指导自己的行动,使中国走向一个新的发展道路。严复根据时代的需要,第一次系统地将西方资产阶级的哲学、经济学、政治学和自然科学介绍到中国来,启发教育了大批中国人,特别是年轻一代中国人。在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的行程中踏入一个崭新的阶段。

这一时期,严复致力于翻译西方哲学、政治学说名著,如赫胥黎

严璩:《先府君年谱》。

《通艺学堂章程》,《中国近代学制史料》下册,第907页。

《国闻报缘起》,《严复诗文选》,第107页。

的《天演论》、穆勒的《名学》、斯宾塞的《群学肄言》、亚丹斯密的《原富》、孟德斯鸠的《法意》、耶芳斯的《名学浅说》等书。特别是《天演论》用自然科学的许多事实,论证了生物界的“物竞天择”、进化无已的客观规律。人们通过读《天演论》获得了一种观察事物、指导行动的观点和方法,使中国人民看到进化是一种不可抗拒的客观规律,从而使中国人民认识到,只要靠自己的力量,坚持自强、自立、自主,命运操在自己手里,就可以改变现实,给当时中国人以发聩震聋的影响,提高了自信心,看到了改变祖国面貌的新曙光,激发了中国人民救亡图存的爱国热情,从而走上革命道路。所以说,《天演论》在当时影响是巨大的,正如当时的评论:“自严氏之书出,而物竞天择之理,厘然当于人心,中国民气为之一变。即所谓言合群、言排外、言排满者,固为风潮所激发者多,而严氏之功,盖亦匪细。”这正是严复在启蒙运动中的巨大贡献。

当然,“物竞天择”的生物规律与社会发展历程不可同义而语,用它来解释社会发展规律也是不科学的。正如恩格斯指出的:“想把历史的发展和错综性的全部多种多样的内容都总括在贫乏而片面的公式‘生存斗争’中,这是十足的童稚之见。”但应承认,在马克思主义未输入中国之前,这种理论在当时确实给中国人民以极大的启迪。

严复中译本《天演论》的出版,在中国引起极大的反响。胡适说:“严复译《天演论》、《群己权界论》、《群学肄言》,在原本有文学之价值,在古文学史上亦有很高之地位。”又说:“其用心与郑重,甚可为吾人之模范。”吴汝纶则说:“盖自中土翻译西书以来,无此鸿制,匪直天演之学,在中国为初凿鸿闳,亦缘自来译手无似此高文

《述侯官严氏最近政见》,《民报》第2号。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72页。

胡适:《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中报馆编《最近之五十年》

雄笔。”梁启超称赞：“西洋留学生与本国思想界发生影响者，复其首也。”蔡元培说：“五十年来介绍西洋哲学者，要推侯官严复为第一。”日人稻叶山在其所著《清朝全史》一书中说：“严复所译之《天演论》，当首屈一指。”

严复向中国人民系统地介绍“西学”，并非完全出自个人的认识和愿望，而是历史的必然。因为，当历史发展到资本主义阶段，“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事实证明，到了近代社会，几乎没有一个国家不进行国际的文化教育交流，东西文化相互影响、交融成为不可避免的历史趋势，在追求和创造文明的道路上，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必须打破国家、民族、地域的狭隘界限。严复正是冲破闭关自守，放眼世界，促进中西文化交流的启蒙思想家，并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但是，自戊戌政变后，严复政治上开始由进步转向保守。1905年他与孙中山关于革命与改良的辩论是重要转折。

自此，严复逐步投向了封建王室和新旧军阀，特别是当辛亥革命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中国开始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他更加节节后退。1912年袁世凯任命他为京师大学堂校长。1915年他参加“筹安会”，为袁世凯的倒行逆施，恢复帝制活动效劳。公开宣称：中国不宜实行共和，只能实行专制，为袁世凯的复辟活动制造舆论。“五四”运动发生，他攻击说：“从古学生干预国政，……皆无

吴汝纶：《答严几道书》。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

中报馆编《最近之五十年》。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4页。

良好效果。”随着政治上的日益反动，思想上则积极提倡“尊孔读经”，说什么，“孔孟之道，真量同天地，泽被环区。”他同马其昶、梁启超等人组织“孔教会”，发表《读经当积极提倡》的演说，撰写《导扬中华民国立国精神议》论文，宣扬忠孝节义封建道德。这位曾显赫一时的先进中国人，最终堕落成为保守势力的拥护者，而终结了一生。

（二）批判“中学”，提倡“西学”图强论

严复面对濒临被列强瓜分的中国政局，主张向西方学习，自强图存。他批评顽固派墨守成规，不思变革的陈腐观念。他立足于“变而必强”的思想，阐明救亡的理论。

首先，他分析“中学”与“西学”的区别。他说：“中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胜古”；“中国委天数，而西人恃人力”。在这里，他将“中学”与“西学”区别为：第一，“古”与“今”，“天数”与“人力”。中国人好古忽今，西人力今胜古。所以，中国因循旧章，不思变革，西人追求未来，改变现实。第二，中国靠“天数”，命运，西人恃“人力”，自强。所以，中国听天由命，顺其自然，西人恃人定胜天，自强竞存。他认为，中国必须改变这种陈腐观念，以一种全新的态度对待自然、人生和社会。这种见解，对于破除封建意识形态，蔑视传统权威，无疑是一种巨大的心理力量。使中国人民增强自信心，依靠自己的力量闯出一条新路。这是一种符合时代需要的世界观。

其次，严复认为“中学”务虚，“西学”崇实。他在《论世变之亟》一文中有一段中西对事对物不同态度的描述：

《书札》六十一，第 20 期。

《与熊纯如书札》。

《论世变之亟》，《戊戌变法》（三），第 71 页。

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国贵一道而同风，而西人喜党居而州处；中国多忌讳，而西人众讥评。其用财也，中国重节流，而西人重开源；中国追淳朴，而西人求欢虞。其接物也，中国美谦屈，而西人务发舒；中国尚节文，而西人乐简易。其于为学也，中国夸多识，而西人尊新知。其于祸灾也，中国委天数，而西人恃人力。

他概括说：“苟扼要而谈，不外于学术，则黜伪崇真，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而已。”他认为，中国趋虚避实的观念不转变，必然会闭目塞听，看不到西洋的长处，或不愿学习其长处以改造中国，甚至于“其祸可至于亡国灭种，四分五裂而不可收拾”。因此，非向西方学习不可，因为，“其为事也，一一皆本诸学术；其为学术也，一一皆本于即物实测。”也就是说，一定要学习西方的崇实精神，以改造中国。

最后，他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学“为祸也，始于学术，终于国家。”因而，要想富强，“非开民智，非讲西学不可”。“救亡之道在此，自强之谋亦在此”。

当然，严复对于“中学”、“西学”区别的分析，有极大的片面性。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不象他描述得那么美好，中国的传统文化，也不象他所说的一无是处。但这种思想，在冲破封建网罗，打开闭关锁国的封建大门，使人们重视现实，面向未来，放眼世界，树立改造中国的信心，应该承认是进步的，符合时宜的。

《戊戌变法》(三)，第72页。

《戊戌变法》(三)，第75页。

《原强》，《戊戌变法》(三)，第49页。

《救亡决论》，《戊戌变法》(三)，第65页。

《原强》，《戊戌变法》(三)，第57页。

《救亡决论》，《戊戌变法》(三)，第70页。

基于上述理解,严复对中国传统的封建文化教育以无情的批判。他认为,周孔之教“自可娱”,但与世事无补。“六经且有不可用者”,依靠这些去救亡图强,无异于“蒸砂成饭”,永远不可能实现。进而他对于宋学、汉学、科举、词章、金石、书法等也都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说:“一言以蔽之,曰无用”,“曰无实”。他指斥陆王心学是“师心自用”,是“闭门造车”,因而不可能“出而合辙”。他进一步分析,旧学所以与事无补,究其原因,则在于多求“古训”,而失之于“本诸格致”。他认为那种“徇高论而远事情,尚气矜而忘实祸”的学风,是学术之大患。严复强调科学技术对国家富强的重大意义。在《原强》中,他列举牛顿、瓦特、法拉第、培根等人的贡献,都在于从实际出发。所以他说:“夫理之诚妄,不以口舌争也,其证存乎事实。”而“中学”恰恰相反,“若以中学而言,则古书成训,十九皆然。而宋代以后,陆王二氏心成之说尤多。”因此必须改变这种学风。

(三)“自由为体,民主为用”的教育救国论

严复大量翻译介绍了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说和自然科学知识。目的在于说明资本主义国家强盛并不在于“船坚炮利”,也不在于“善会计”、“善机巧”,关键在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刑政则屈私以为公”。意即只有学习西方务实的科学方法和民主的政治制度,才能使中国富强图存。这正是后来“五四”时期明确提出来的科学(赛先生)与民主(德先生)两大口号。

严复的“自由为体,民主为用”的体用一致论,是以英国为榜样

《救亡决论》,《戊戌变法》(三),第64页。

《救亡决论》,《戊戌变法》(三),第63页。

《原强》译书例言。

《穆勒名学》部乙按语。

的欧洲资本主义的经济和政治制度来实现救国的理论。他认为,一个国家的政教学术就好象生物的各种器官,是完整的统一体。那么,西方社会的“体”、“用”又是什么呢?他说,自由是“体”,民主是“用”。“西人之言曰:唯天生民,各具赋畀,得自由者,乃为全受,故人人各得自由,国国各得自由,……而其刑禁章条,要皆为此而设耳”。这些正是西方所以能够富强的根本,却是“中国历古圣贤之所深畏”的。基于这一认识,严复强调民权,批评君主专制、君权至上思想。他说:“斯民也,固斯天下之其主也。”又说:“是故西洋之言治者,曰:国者斯民之公产也,王侯将相者,通国之公仆隶也。”

严复的体用一致论,在文教方面表现为,区别“中学”与“西学”、“西政”与“西艺”的关系。他认为,把“中学”和“西学”看成是体用关系、主辅关系,把“西政”和“西艺”看成是本末关系,都是不妥当的。所以,他批评洋务派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西政为本,西艺为末”,“主干中学,以西学辅所不足”等观点。他指出,这种思想,“其害于吾国长进之机,少者十年,多者数纪”。他强调区分中、西学的重要意义,“中西学之为异也,如其种人之面目自然,不可强谓似也。故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两立,合之则两亡。”同样他认为,也不能说“西政”为本,“西艺”为末,因艺是指名(逻辑学)、数(数学)、质(化学)、力(力学和物理学)等科学而言,而“西政”正是以科学为基础的。“艺政二者乃并出于科学,若左右手。”没有听说,左右手还有什么本末之分的。他认为,“中国之政所

《论世变之亟》,《戊戌变法》(三),第73页。

《辟韩》,《戊戌变法》(三),第81页。

《与外交报主人论教育书》,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文选》,第218页。

《与外交报主人论教育书》,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文选》,第218页。

以日形其绌”，正是由于当政者“于其艺学一无所通”。不懂科学，又要使国家富强，无论如何是不可能的。所以他得出这样结论：“一国之政教学艺，其如具官之物体欤，有其元首脊腹而后有其六府四肢，有其质干根鬲而后有其枝叶实华。”“辅”与“主”绝不是同一事物，因此，认为“教育中西主辅之说”，是持其一端，是错误的。

在他看来，中国当时最大的忧患，是愚、贫、弱。而三者之中，以愚为最重，所以“愈愚”才是根本。教育的任务就是教人以自强，给人民以智慧。所以要救中国，“为今之计，惟急从教育上着手”。他自己也把一生贡献于译著和教育事业，成为中国近代教育救国论的先驱。用什么教育去“愈愚”呢，当然是“西学”，他说：“西学为当务之急明矣。”他告诫说：“事功成否，恒视其所由之术，而不从人意为转移。”他所说的“术”，就是西方的科学技术和在科学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政治学说。他说若违反这个道理，“则他日学堂自无成效。”所以，此后的中国教育，“在在宜著意科学，使学者之心虑沈潜浸渍于因果实证之间，庶他日学成，有疗病起弱之实力，能破旧学之拘挛，而其于图新也审，则真中国之幸福矣。”

严复把救亡、富强放在对人民的教育上。在他看来，只有每个人都受到良好的教育，都能够自治、自强，然后才能实行资本主义的民主制度，国家才能繁荣富强。到了他生活的后期，甚至认为，由于中国之民智未开，仍应保存君主制度。因而导致他将“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作为变法改革的根本。这一思想，愈到他生活的后期

《与外交报主人论教育书》，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文选》，第218页。

王遽常：《严几道年谱》。

见《与外交报主人论教育书》，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文选》，第222页。

《与外交报主人论教育书》，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文选》，第224页。